

《托洛茨基评传》评介

徐葆初

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苏联一直把托洛茨基看作是一个反面政治人物。我国过去一般沿袭苏联方面的说法，对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没人敢进行研究，实际上形成一个禁区。近年来随着“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学术界日趋活跃，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进行自由讨论和研究，有关论著陆续发表，李显荣著《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简称《评传》），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涌现出来的，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突破。

《评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论托洛茨基的一生。书中下述一些主要观点具有新意：

一是实事求是地评论托洛茨基的功过。《评传》在书末有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在列宁病逝以前，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功大于过，而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以后，他的政治活动是应该否定和谴责的。”（《评传》第590页）这就是说，对他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所起的重大作用应予肯定；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实践予以批评；对他后期拼凑“第四国际”、企图分裂国际共运队伍的错误应予揭露和谴责。应该说，这样功过分明、有分析的评价是接近历史实际的。

二是关于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问题，《评传》认为这主要“是一场政治思想斗争”，属于党内矛盾性质。后来由于托洛茨基等人“坚持了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观点，并采取一套错误办法（秘密的或公开的派别活动，最后发展到公开的示威游行）”（第447页），使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演变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评传》还认为，这场党内斗争“除了存在着政治思想路线的分

歧，还有权力斗争的因素”（第403页）。书中的叙述表明：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矛盾在1922年4月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后就表面化了。列宁看出了这个问题，他“考虑到托洛茨基的才能和在党内的影响，同时也为了不致使斯大林手中的权力过大，因而准备让托洛茨基担任一个新的重要领导职务。”（第357页）但托洛茨基不愿意接受，以后列宁在《遗嘱》中担心党的分裂，想促进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增强党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并指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第377页）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不久，矛盾加剧了，托洛茨基的重要军事领导职务被解除了。之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矛盾也突出起来了。于是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联合起来组成新的反对派，多次发表声明，举行派别集会，直至1927年11月的公开示威游行。书中除了批评反对派外，对斯大林也有所批评，认为他“任性”、“缺乏民主作风”（第363页），“由于他手中掌握很大权力，因而较少考虑对反对派成员做思想工作，而是过多地采取了压服办法，热衷于组织处理”（第447页）。《评传》不回避矛盾，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三是论述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关系问题也对传统观点有所突破。《评传》列举了不少事实说明托洛茨基反对过列宁以及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但着重指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这些重要时期托洛茨基是支持列宁的。《评传》还引用1918年列宁被刺受伤、托洛茨基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探望列宁后发表的一篇称颂列宁的演说，说明他对列宁的尊敬。另一方面，列宁曾多次批评过托洛茨基，但列宁器重和信任托洛茨基的事实也不少：如1918年托洛茨基担任重要的军事领导职务，“说明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他的信任”（第276—277页）；1922年，列宁曾三次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人

民委员会副主席来作他的主要副手；列宁在《遗嘱》中对托洛茨基的评论也是褒多于贬。我国前几年出版、现在多次重印的一部工具书提到托洛茨基“多次对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看来这个论点是片面的。

二

《评传》在研究、写作方面也有一些特点。

首先是材料广泛翔实，并注意选用。作者懂得，材料广泛翔实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前提，本书是在占有相当广泛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所用史料有：苏联官方文件、会议纪录、列宁著作、斯大林著作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书信，还有西方学者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后一部分材料所占比重较小，但有参考价值；1980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布所藏的托洛茨基的一批档案材料，本书也从伊萨克·多依彻的著作中转引了其中有关材料。可以说，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作者搜集到他可能搜集到的各方面材料，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运用材料时还注意选择，有利于论证。例如在论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时，就引用了斯大林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文章中的一段话：“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第233页）还引用斯大林1924年同托洛茨基论战时的话：“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第315页）。毫无疑问，这些引文对论证托洛茨基的作用是有很大说服力的。正是因为作者重视材料，根据材料作出判断，因此作者得以用证据不足来否定对托洛茨基的一些不实之词，弄清一些是非。例如，书中说，“不应有意贬低和抹煞托洛茨基在三年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或者甚至把他描绘成内战中的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物，因为至今并未发现他在内战期间同白卫军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者相互勾结的事实。”（第315页）1936—1938年，莫斯科三次审判时指控托洛茨基谋害基洛夫、斯维尔德洛夫，与帝国主义间谍秘密串通，从事贩卖勾当等。书中对此论道：“把基洛夫的遇害，归罪于托洛茨基，并没有充分

的事实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558页）

“托洛茨基对斯维尔德洛夫是比较尊重的，在那紧张的国内战争年代，前者也不可能对后者产生谋杀念头。”（第573页）“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托洛茨基本人直接加入帝国主义间谍机关。说他同英国间谍串通并伙同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列宁，这也缺乏事实根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至于托洛茨基是否同希特勒政府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在幕后进行勾结，对这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从目前材料来看，还不能轻易下断语。”（第585页）重视材料，根据材料作出判断，这是研究工作者的正确态度。本书作者学风严谨，于此可见。

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论断恰如其分是本书的又一特点。有些问题复杂曲折，尤其需要细致的具体分析，否则就会得出简单化的结论。《评传》对托洛茨基拒签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分析就使人信服。

《评传》首先论述年轻苏维埃共和国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列宁关于立即签订和约主张的正确，而党内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很大。《评传》接着论述党中央对此问题表决的经过。第一次表决，赞成列宁主张的只是少数，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以此拖延时间，以等待德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德军再次进攻，党中央第二次表决时，托洛茨基投票赞成列宁的主张，因为德军的进攻证明他原先的判断是错误的。当德国提出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党中央再次进行表决时，托洛茨基弃权，结果列宁的主张获得多数票通过。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在拒签和约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但书中的分析表明，他的错误与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象后者走得那么远，而且他在几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承认自己的这次错误。

《评传》公正地指出，“托洛茨基这个错误不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群众基础。”同时指出，有些历史著作把他的错误“说成是‘叛卖行径’和‘奸细路线’，这未免是言过其实，上纲太高。”（第271页）《评传》还引用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谈到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对德和约的错误时，也还不应该全盘否定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期间的活动。”

（第271页）这样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对问题的论断就能做到恰如其分。

《评传》肯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了较大作用的同时，也用了相当篇幅批评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过分夸大，甚至吹捧他在十月革命中的功绩，批评托洛茨基1924年9月所写《十月的教训》一文，“以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名，歪曲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和伟大的十月革命事件，贬低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而只强调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大肆吹嘘自己”，以“突出自己在这一胜利中的作用”。（第385页）《评传》也批评有些著作过低评价或甚至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作用的倾向，驳斥了有人以托洛茨基在举行武装起义日期问题上与列宁有分歧为由从而否定他所起作用的论调。这样具体分析，就使读者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了解得更清楚了。《评传》在肯定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时期所作出的贡献时，指出他在军事工作中也犯有错误，如行政命令主义严重，忽视部队的思想教育，轻视部队政治委员的作用，在吸收旧军事专家参加红军建设的过程中也有用人不当之处等。《评传》分析1920年8月红军进攻华沙失败一事很有特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此次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之于托洛茨基。而按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他是“反对向华沙挺进”的，因为在他看来，红军的“兵力和物质薄弱，这次进军只有在波兰内部立即发生起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而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保证的。”托洛茨基的主张遭到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反对。后来列宁谈到进攻华沙失败时，认为“造成这些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并未归咎于托洛茨基个人（第314页）。《评传》把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列宁对此问题的论点摆出来，虽未置评，但意图是很明显的，即作者是同意列宁的观点的，这其实也是作者的一种具体分析。又如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托洛茨基以“中派”立场，试图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搞调和，《评传》批评他“貌似公允，实际上却袒护孟什维克”；但书中也指出，他在此“期间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同布尔什维克唱反调”，例如在对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估价上，他“的观点是不同于其他一些孟什维克的”（第101—102页）。

此外，托洛茨基早期有的观点，后来有了改

变，《评传》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例如托洛茨基原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晚年他住在墨西哥，“通过对墨西哥民族资产阶级的考察和分析，使他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面前能够起到比较独立的作用，能够同工人一道迫使帝国主义让步。”《评传》认为，“托洛茨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作出一定的改变，无疑是同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卡德纳斯总统的政绩分不开的。虽然，卡德纳斯政府的政策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它所实行的反帝反封建改革却使全体墨西哥人民获得最大的好处。”（第577页）

三

现在我国第一部全面评述托洛茨基一生的著作出版了，正好说明当前我国学术界思想解放和自由讨论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它对我们大家——对《评传》的观点无论是同意的、部分同意的或甚至完全不同意的——都是一种鼓舞，不同的观点可以进行探讨，只会有助于这个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应该指出，历史人物中有些善始而不能善终类似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对他们一笔抹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而象《评传》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既然象托洛茨基这样难度较大的人物传记都出来了，人们当然期待着其他类似人物的传记将会接着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传》对今后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一种推动和促进。

当然，《评传》毕竟是从禁区中冲出来的我国第一部专著，它带有某些不足之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致死一事曾轰动一时，我们虽不应、也没有必要象西方学者那样故意渲染，但是《评传》仅简单叙述被刺过程，而对刺杀案有无政治背景之类的问题，没有展开论述，读者对此是会感到不满足的。书中类似的不足，可能由于作者的思想还没有放开，也可能由于材料不足。科学研究总是逐步深入，最后才能达到完善的地步，我们不必苛求于作者，具有开拓性质的《评传》的问世，毕竟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深感悲痛的是，作者正当盛年，但由于不幸身染重病而在不久之前去世了。我们只能期望其他史学工作者在此基础上，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入一步。